

# 刘 少 奇

吴 家 林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理论家和组织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在职工运动、白区工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以及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经济文化建设、外交工作等方面 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刘少奇总结的经验和得到的理性认识，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并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同创造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的。这样一位杰出人物 最后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惨遭遇，更是中共党史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幕悲剧。

## （ 一 ）

刘少奇字卫璜 又名绍远 曾化名胡服、陶尚行等。1898 年 11 月 24 日，他诞生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父亲刘寿松 粗通文墨，为人忠厚。母亲鲁氏 勤于劳作 精于家计。刘少奇有兄长三人 姐姐二人。长兄默卿、二兄云亭、三兄卓

衡，唯二兄对他影响较大。刘少奇系农家子弟，参加劳动较早，6岁起便放牛、拣柴、做辅助劳动。8岁启蒙，先后在柘木冲、罗家塘、洪家大屋等地读了6年私塾，接受写作训练和国学经典的熏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受正在长沙当新军的二兄云亭的影响，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表示同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决裂。两年后，刘少奇考入宁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成为新式学堂的学生，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科学教育。几年中，他的思想日益前进，学习兴趣不断增高，成绩十分优异。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及黄兴等人，成为他心目中受尊崇的人物。1915年，袁世凯希望日本支持他以在中国复辟帝制为交换条件，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因此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怒，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刘少奇与学生们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标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袁世凯称帝，刘少奇更加义愤填膺，积极参加街头讲演，声援讨袁的义师。1916年夏天，他考入宁乡驻省中学，地址在长沙市区。同年秋又改考陆军讲武堂，后因讲武堂毁于“护法战争”中而未能入学。至此，刘少奇又不得不另找别的出路。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长沙有一批青年人为反帝爱国运动大潮所吸引。刘少奇与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乘车赴京，曾想留在这个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心——北京求学，并已报考了几个高等学校，皆因学费昂贵或学制过长而作罢。在北京他拜访了留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由李推荐他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在预备班内，他一面学习法语、机械学、画图等课程，一面在实习工厂里学翻砂、钳工、木工等技术。在这里，刘少奇受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等进步报刊陈列于学校的书架上。师生还自办刊物，激扬文字，慷

慨陈词进行革命宣传。1920年预备班停办，刘少奇本应赴法勤工俭学，但由于缺少路费而未能如愿。

1920年夏天，刘少奇返回长沙，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负责人贺民范的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主功俄文，为留苏作准备。萧劲光回忆说：“我们到了上海后，认识了少奇同志。不久我们就加入工读互助团，少奇同志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作些宣传工作，有时作工。”“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六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sup>①</sup>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曾来校讲授他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底，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第一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1年初，刘少奇结束了18个月和学校生活，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通过杨明斋的关系，他们一行计十多人赴苏俄学习。他们从吴淞口乘船，经长崎、海参崴进入苏俄，再乘火车经伯力、黑河、赤塔等地，因当时交通极为不便，走走停停耗时三个多月，于同年夏季到达莫斯科。当时正值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同代表们住在一个旅馆，有时旁听会议发言，并且见到了列宁。会议结束后，他们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校学生多来自远东各国，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习主要内容是政治、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文。1921年冬天，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开始建党，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

萧劲光：《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见《缅怀刘少奇》第70—71页。

参见萧劲光：《忆早期赴苏学习的少奇同志》。

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1922 年 1 月，莫斯科举行东方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及东大学习中国学生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大会，并担负起大会的翻译和文书工作。

在东大生活很艰苦。中国留学生虽享受较高的俄国红军生活待遇，但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sup>①</sup>有一些中国学生“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但刘少奇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对自己要求很严，纪律性很强，有明确的革命事业心，团结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坚持学了下来。

## （二）

1922 年，刘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到祖国的上海，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不久奉调回家乡湖南，9 月他受湘区书记毛泽东的派遣，协同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大罢工。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时有工人 17000 人。安源路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劳动和生活状况非常困苦。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工人群众迫切要求中共组织及工人俱乐部领导他们开展罢工斗争。

1921 年冬，毛泽东两次赴安源调查，接着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作。1922 年 2 月建立中共安源支部，5 月成立工人俱乐部，9 月初毛泽东再次去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接着又派刘少奇去安源，加强对罢工工作的领导。

经过较充分准备以后，安源工人于 1922 年 9 月 14 日举行大罢工。罢工宣言中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放欠

见《缅怀刘少奇》第 75 页。

饷及废除封建把头制等 17 项要求。路矿当局玩弄各种手段，企图破坏罢工，甚至动用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由于有了刘少奇、李立三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坚强有力的指导，以及工人群众团结一致，遵守纪律，争取社会舆论同情，注意斗争策略，因而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当时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勇敢地与有武装保护的路矿代表谈判。戒严司令在谈判桌上多方恐吓工人代表，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为动”反驳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这时“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sup>①</sup>。9月18日，由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订了正式条约，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后来李立三同志谈起这次安源罢工，总结经验有以下几点：首先应利用一切合法可能，争取公开活动。其次，注意罢工斗争策略，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再次，扩大统一战线，注意做好青红帮工作，变阻力为助力。最后，最重要一点，是加强党的领导。“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自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的各方面工作”。<sup>②</sup>

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作三年，成绩的确很大。李立三离开后，他是俱乐部主任。刘少奇勤于学习和善于总结经验，从1923年8月至1925年4月，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整顿萍矿意见书》及《“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专著和文章。“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运处于低潮。唯独安源工运在刘少奇领导下，团结内部，采取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第14、15页。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人运动》，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第145至148页。

守势 是‘硕果仅存’的典型一例。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与北方工人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等出版物 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 宣传因而大广 于是要求解放之念”。<sup>①</sup> 由于《工人周刊》对安源工人的影响扩大，因而引起刘少奇等人的关心。1922 年末 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工人周刊》聘请刘少奇任特约通讯员。他经常给《工人周刊》负责人罗章龙去函。其中一函建议：“《工人周刊》虽然是北方分部的机关报 但不要把目光只放在北方，应该发表一些全国各地的工运消息，以全国工人为对象。”<sup>②</sup> 后来，《工人周刊》曾发表过不少介绍安源路矿工人斗争的文章，大都是刘少奇写的或派专人写的。《工人周刊》赔钱越来越多，刘少奇动员安源工人捐助。刘少奇从来都把工人运动看作一个整体 互相关心 不分彼此 把别的地区的斗争 也看作对自己斗争的支援。<sup>③</sup>

1925 年，刘少奇离开安源赴广州，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会后，他被派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工作，具体指导上海及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刘少奇抵达上海，参与并指导了刚刚兴起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后，他兼任市总工会总务主任职务。为了实现全上海的‘三罢’斗争 他与蔡和森、李立三、刘华等同志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奔走在工运第一线。6 月 1 日 全市举行了 20 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和 5 万余学生的罢课。刘少奇从安源工人运动经验出发，要求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 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第 4 页。

② 罗章龙：《少奇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 见《刘少奇与中国工运》第 136、137 页。

罗章龙：《少奇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见《刘少奇与中国工运》第 137 页。

罢工工人必须有良好的组织纪律不可。另一方面，力求国际上的援助。他致电赤色职工国际及苏、美、法、日等工人团体，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人的斗争。上海罢工斗争在各方面的支援下，坚持了三个多月时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提高了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

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刘少奇的健康受损，终于病倒了。同年 11 月，由妻子何宝珍护送回湘休养；12 月却遭当地反动政府逮捕。由于全国工人和进步团体以及社会人士的援救，1926 年 1 月他被驱逐出湖南。刘少奇赴广州后，代理林伟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参与和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2 日，刘少奇参加并主持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他受全国总工会的委托作了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工会工作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五卅运动中的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科学地指出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等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基本思想相一致<sup>①</sup>。会上，刘少奇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1926 年 9 月中旬，总工会汉口办事处成立，刘少奇任办事处秘书长。办事处的任务是直接领导鄂、湘、赣、皖等省的工人运动。10 月，刘少奇随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到达武汉，为全总迁址武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兼任湖北总工会组织部长等职。为筹办武汉工人讲习所，他日夜操劳，并且亲自讲授课程，如《工会组织法》、《工会技术工作》、《中国工会三次劳动大会》等。为了总结中

<sup>①</sup> 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3 页。

国工运的新经验 他还撰写了《工人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在这三本小册子中 刘少奇给予广大工人和工会干部以最基础知识，同时也提出了巩固工会的方针和方法，这对于以后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和促进工运健康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sup>①</sup>

1927 年 1 月初，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驱逐英巡捕、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运动。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力量，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时局危机，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于 1927 年 4 月底至 5 月上旬，在武汉召开了“五大”。刘少奇参加了大会 并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在工人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蒋动员。在此期间，刘少奇还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作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6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解散湖北总工会所属的工人纠察队的决定。向忠发、刘少奇等只好服从中央决定，宣布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强加给刘少奇的所谓“阶级投降主义”的一大罪名。

### （三）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被安排到江西庐山养病。病情不见好转，中央决定他转移至上海治疗。1928 年初，他在上海参加了为准备召开“六大”而举行的有关人员座谈会。在会上 刘少奇指出不能笼统认为革命形势一味是高潮，主张要对形势作具体分析。他

见《刘少奇工运活动大事年表》，《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第 378 页。

说，“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趋势”<sup>①</sup>，希望中央注意城乡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同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虽未能出席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8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赴天津参加全国铁总的领导工作；6月负责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不久中央又决定他参加顺直省委常委，7月22日由他和陈潭秋等人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省委领导班子的问题，不适当地改组了顺直省委，成立了以韩连惠为首的新省委（刘少奇及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驻顺直省委），从而引起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的不满。京东地区一些党组织成立了“护党请愿团”表示不承认新省委。由于刘少奇过重地估计了顺直省委问题，处理方法又不妥当，不但原有问题没有解决，并加剧了党内矛盾的发展。年底，周恩来来到天津，按照中央决定恢复了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健全了省委领导班子。至此，刘少奇在顺直省委扩大会上作了检讨。他说，首先“在路线的原则上就犯了取消一切的偏向”。“因为否认一切麻烦的问题，就否认在党的旧基础中找到改造党的出路”。其次，“认为现在所有同志都是腐烂了也不是事实”而“党的新基础也只有经过党的旧基础才能去建立”。再次，“在党内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在积极工作去纠正同志的错误观念”，决不能“弄到把工作停顿起来专门去肃清障碍”<sup>②</sup>。刘少奇的胸怀是坦荡的，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旦发现并认识，就进行自我批评加以改正。

刘少奇在北方期间，除处理顺直问题外，还做了以下两件事：

参见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见刘少奇：《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

第一件事是1929年1月至2月上旬到北平巡视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给中央写了巡视北平工作报告，并帮助北平市委制定了《北平市委工作计划》。刘少奇深入北平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到西直门车站支部、人力车支部、北京大学支部及通州区委，询问情况、指导工作。傅于深回忆说：“1929年初春的一天，刘少奇同志在胡锡奎同志陪同下，来到位于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第二院西边的‘西斋’宿舍元字第一号房间”。胡锡奎首先介绍说：“少奇同志是党中央派来北方视察党务的，今天来参加北大支部会议，请大家汇报一下情况，提出一些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sup>①</sup>支部书记作了汇报，组织、宣传两位干事作了补充发言。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作了如下指示：第一，“肯定北大支部恢复组织的工作成绩”；第二，阐明了“党的六大会上确定的民主革命十大纲领”；第三，强调党的组织纪律，工作上要“讲究科学方法”；第四，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等等<sup>②</sup>。

2月初，他赴通州，视察刚刚成立不久的通州区委（下属黄瓜园、新城、潞河中学及南地4个支部）工作，并找了区委书记谈话。这位书记“是一名电话工人，水平低，党的主义、策略可以说完全不知”<sup>③</sup>。北平市委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很快对通州区委领导人进行调整，区委书记改由马国英担任。在巡视工作过程中，刘少奇还将在北平了解的情况，于2月8日写成《邵琪巡视北平工作报告》送中央及省委。他在报告中，汇报和总结了北平工运、农运、兵运、学运及市委工作等五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批评北平市委在政治上、

傅于深：《关于刘少奇同志视察北京大学党支部的回忆》，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2月总5期。

傅于深：《关于刘少奇同志视察北京大学党支部的回忆》，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2月总5期。

<sup>③</sup> 《邵琪巡视北京工作报告》1929年2月8日（存河北省档案馆）。

工作上“甚弱”的缺点；并要求中央派人参加市委指导工作<sup>①</sup>。

北平市委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下，于1929年2月召开市委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北平市委工作计划》。其内容大致如下：第一指出这个计划是在党的六大及省委12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基础上制定的。第二，指出党的工作环境——北平是顺直政治中心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及人民痛苦的情况。第三指出北平党的工作主要缺陷是：缺乏坚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没有深入到工人中去。第四利用有利的客观环境；深入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sup>②</sup>。第五，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要求建立和健全产业支部；慎重吸收新党员注意秘密工作方法健全市委领导班子。第六提出“目前宣传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我们的政纲和政治主张，介绍给社会一般群众了解”。第七，指出职工运动工作是党的基本工作而铁路工作应为北平联运中心工作之一。第八指出“农运工作是北平的重要中心工作”。要对北平周围、铁道附近、工人群众所在地如门头沟、长辛店之农村工作作有系统的布置<sup>③</sup>。第九，必须纠正过去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健全市委军事科。第十“加紧反帝工作”，积极领导反帝运动”。第十一加紧对学运工作的领导。第十二，要求在党的会议上经常讨论团的工作。第十三，帮助济难会的党团，发展济难会的群众组织和扩大济难会的宣传工作。第十四，指出市委要有计划地开展妇女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第二件事，就是刘少奇在恢复和整顿北方党组织的过程中，在领导职工运动特别是铁总工作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工作体会和经验写成文章如《论口号的转变》、《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

① 转引自《北京革命史大事记》第113页。

② 见《北平市委工作计划》。

③ 见《北平市委工作计划》。

④ 见《北平市委工作计划》。

吗》、《怎么改造顺直的党？》及《错误观念的纠正》等等。这些文章，对于当时及其以后的实际工作的指导，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1929年4月，刘少奇奉调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6月初，中共中央又决定派他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中旬刘少奇抵达奉天（今沈阳市）。8月20日，他在参加奉天纱厂党支部研究如何进行罢工斗争时被捕。因奉系军阀没有掌握他的“煽动工潮”的证据，因而半个月后被取保释放。此时中东路事件爆发，中共中央要求满洲省委必须集中精力处理此事。刘少奇立即赴哈尔滨。他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提出扩大目前正在进行的以三十六棚（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代称）为中心的工人罢工斗争。并强调把工人反对减少待遇、生活恶化的经济斗争同拥护苏联、反对军阀进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12月22日苏联和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伯力草约》，规定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吸收的中国工人全部裁减。但对同期吸收的大批白俄工人则一个不减，从而激起中国工人强烈不满<sup>①</sup>。1930年1月，刘少奇再度由沈阳去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群众为谋自身生存的斗争。广大失业工人组织失业团，迫使中东铁路当局答应失业工人的要求。工人开始复工，罢工斗争基本取得胜利。3月13日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了《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结报告》。不久他离奉赴沪。

1930年夏，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国内召开，在会上刘少奇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在此期间，刘少奇在内部报告中和党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主张，实事求是地估计了当前的政

参见朱元石、黄峥：《刘少奇》。

治形势，提出了在革命低潮时期应采取的防御方针。他不同意当时中央执行的‘左’倾方针和盲动行为，因此遭到临时中央的批评，说他不执行中央路线，对形势估计不足，向黄色工会投降，有合法主义倾向等等。为此，他被迫写了“检查”。

1932年冬，刘少奇离沪至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当时，正值蒋介石调集重兵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他领导苏区广大职工，一面动员他们加入红军组建工人师，为保卫苏区而战；一面组织工人生产（包括武器弹药、柴米油盐布匹等）支援前线 and 苏区建设。当时苏区工会内部，存在着忽视工人的经济利益的倾向，同时又存在工人过高经济要求的倾向（例如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照搬大城市的劳动法）。刘少奇对上述两种倾向和做法，都进行了坚决而又积极地纠正。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7月，他被调往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0月红军长征开始，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参加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及6月的两河口会议、9月的巴西会议等。同年10月，他随红军到达陕北。中央决定他分工主管工会工作；由他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并兼任委员长。

#### （四）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作为中

央代表被派往华北地区，负责北方党务工作。他于次年3月，到达天津。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深入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华北地区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许多组织被破坏了。“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sup>①</sup>。就在这些很少的组织和干部中，仍然存在着严重“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

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郭清、北平十七中学生被捕后惨死狱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700多人，都是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会后进行了抬棺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北池子时，反动军警对游行实行残暴殴打及逮捕。学生们被打散，54人被捕，多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

4月5日，刘少奇看到4月1日《大公报》（天津）刊登关于北平学生追悼郭清抬棺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新闻后，立即给北平同志写信——《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指出在革命低潮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党组织的任务是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力量，避免同敌人决战，而北平党组织却脱离广大群众，集中少数学生骨干进行抬棺游行。这样，“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造成极大损害”。当然，这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不是你们负责的，而是有长久历史的。<sup>②</sup>刘少奇在这封信中，不仅指出错误行动的性质，而且分析了错误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

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

<sup>①</sup>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见《缅怀刘少奇》第80页。

刘少奇：《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一文。

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在同年4月他撰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sup>①</sup>、《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肃清空想的领导作风》等一系列文章。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策略任务就是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sup>②</sup>。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关键在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其主要障碍是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其次，刘少奇在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第一，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第二，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艺术，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和要求。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我们却提出“首先是拥护苏联，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在第二位”<sup>③</sup>。第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的发展。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同盟，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第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sup>④</sup>。第五，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

文中“立三路线的残余”，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至24页。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至28页及《六大以来》上册第75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页。

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第六，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吸引他们与我们的联合”。第七，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组织上表现为害怕和反对知识分子、军官、有社会地位的人入党。在党内斗争上往往采取过分的、机械式的形式与方法。

再次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危害：“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许多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和屠杀”；“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资料”；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对党进行破坏<sup>①</sup>。过去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天津、北平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总之一句话，阻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障碍着党和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

最后，刘少奇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第一，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不敢同他们建立暂时联合战线。第二，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主动起来关门。第三，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

刘少奇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总结了1927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丰富经验。指出：“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sup>②</sup>他在另一篇题为《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文章中指出“空谈主义”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并且分析了空谈的范围、表现及其纠正的办法。最后他提出，“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页。

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页。

谈<sup>①</sup>。

刘少奇到达平津以后 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深刻地具体地阐明了中共中央正确路线和斗争策略，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为顺利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指导与促进作用。

在刘少奇具体指导下 北平市委进行了改组 李葆华任市委书记，李雪峰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将省委特派员李常青调走，柯庆施调任省委驻北平代表，领导北平工作。

1936年5月，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 日本向华北大举增兵 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为了反对日本增兵，北方局决定发动平津学生示威游行。5月28日，天津学生、工人和市民一万多人参加示威游行，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 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彻底清查海河浮尸、反对武装走私”等口号，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6月13日 北平学生在刘少奇和河北省委的一再催促下，动员群众在鼓楼召开大会，举行了示威游行。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对二十九军官兵产生了极大影响。刘少奇对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作了一番细致研究后，认为他同日本关系较深，但在全国抗日高潮推动下，还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亡国奴，有可能转向抗日方面。在此次游行中，宋哲元并未派军警前去镇压。刘少奇指示北平学联及时制止了呼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呼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sup>②</sup>的响亮口号。不久 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 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国运动的立场上。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至45页。

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第86页。

见《缅怀刘少奇》一书，第82页。